

深入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位女县长

□ 侯晓琴

安塞，地处西北内陆黄土高原腹地，在延安的正北面。延安时期，有20多个中央直属机关设在安塞，当时是党中央重要的后方基地。1941年，一个消息传到安塞，犹如一颗重磅炸弹一下子炸开了。

安塞来了个女县长

“安塞来了个女县长”“安塞要成‘女儿国’了”。听到这个消息，安塞的老百姓有些想不通：“别的县长都是男子汉，为什么咱县上要派一个女县长？”虽然党中央落脚陕北后，很快就在人民群众中开展了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的宣传教育，但对接受新思想不久的老百姓来说，让一个女同志当县长，能不能干得好，还不是很放心。加上同时又来了三位女同志，是否要把一些男同志换下来，有些干部的情绪也开始不稳定起来。

这位女同志是谁？她为什么能到安塞县当县长？她能不能当好这个“父母官”？

这位女同志就是邵清华，江苏武映人，出生于1918年12月。1935年4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时她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天津、西安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7年10月，按组织的决定，邵清华来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不久被派往绥德地区组织开展妇女工作。她做妇女工作时很有魄力，先后担任三边分区妇联副主任、绥德分区妇联主任。1940年12月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妇联执行委员。

1941年，陕甘宁边区根据“三三制”原则，进行第二届各级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十分注重对妇女群众的发动，号召广大妇女参选参政。延安女子大学的学生参加了边区政府举办的选举训练班，并派出选举工作团到绥德、清涧、子长、吴堡等县开办训练班，普及选举知识，扩大宣传，训练选举干部。在选举中，由于妇女群众大多不识字，就采用“投豆豆”“烧洞洞”的方法，同意谁就在谁准后的碗里放一颗豆子，或请识字的人念选票，用点燃的香在候选人的名字下烧个洞，表示同意。在这次选举中，选出乡级女参议员2005人，县级167人，边区一级17人，一些妇女荣任乡长、区长。年仅24岁的邵清华当选为安塞县县长，成为陕甘宁边区第一位女县长。

1941年7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与边区妇联专门召开座谈会，欢送女县长赴任。延安女子大学还从高级班选调章岩、路岩、李蕴辉三位女干部协助邵清华工作。中央妇委的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都热情支持她，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鼓励她以实际行动努力工作，更广泛地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多做调查研究。

初到安塞，邵清华就深入基层一线，从最远的七区开始调研。这里有一百多里远，且道路崎岖，只能徒步翻山越岭。在面对面和群众交谈中，她了解到军属的困难，发现有的人好吃懒做不好好劳动、跳大神的“神汉”装神弄鬼骗人、有些干部工作作风不好……她及时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和区、乡、村干部研究解决办法。第二次下乡，她来到全县第二偏僻的五区，了解到基层在征收粮食时，只是自上而下分配任务，但对群众手里有多少粮食心中无底，提出的定额超出群众承受能力，在粮食歉收年时，矛盾就特别突出。负责征粮任务的有些干部方法简单，态度不好，引起了群众的反感。根据这些情况，邵清华及时召开干部会议研究讨论，要求各级干部讲究政策，注意工作方法，特别是歉收的地方要如实报告灾情，及时减少这些地方的征粮任务，对确有困难的农户，不仅不征公粮，还发粮救济。如此一来，群众的困难解决了，他们很受感动，更加踊跃交纳公粮，提前完成了征粮任务。

为了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邵清华亲自下到每个区宣传动员，帮助建立春耕委员会。她亲自到徐家沟抓试点，组织变工队互帮互助，生产搞得热火朝天，就连一贯游手好闲的人也被带动参加了生产。徐家沟的经验很快在全县推广开来。安塞原来不产棉花，也很少有人会纺织织布。邵清华就请来外地一位会纺织的妇女来教大家。先动员17名妇女学习，在掌握了技术后，又派她们到各区去当老师，用滚雪球的办法，使纺织很快在全县开展了起来。

“深受该县民众之欢迎”

邵清华工作有思路有方法，又公正公平、吃苦耐劳、平易近人，很快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就连那些刚开始不服气的男同志也逐渐认可了她。

安塞县绝大部分人没有长途运输的习惯，只有个别跑运输的脚户。为了完成好上级赋予的运盐任务，邵清华就以有经验的人为骨干，以有骡、马等牲口的人家为主，组织运输大队和分队，并耐心向群众解释运盐工作的意义、政策和方法。第一次任务完成后，她组织大家及时作小结。群众看到，参与运盐的各户还有一些收入、运输费用也能得到补偿，表现好的还受到了表扬和奖励，纷纷表示也愿意参加运盐工作。之后的运盐工作就比较顺利了。

安塞六区曾因歉收，发生过一起哄抢粮库事件。邵清华上任后，注意倾听群众反映。经过调查，查实原化子坪乡指导员张彦等个别干部平时就勾结起来盗窃粮库粮食。在群众吃粮困难时，既不向上级反映，也不想办法为群众借粮，反而挑唆群众抢粮，企图乘乱掩盖他们非法盗窃粮食的罪行。邵清华下令逮捕了张彦，从重处理了贪污盗窃国库公粮的坏分子，并在全县开展遵纪守法教育，着重教育干部和党员廉洁奉公，带头遵纪守法。

安塞原本文化落后，女孩子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邵清华到任后，在县政府附近办起了一所女子小学，请女校长、女教师来任教。开始只有几十名学生，后来发展到一百多名。学生不分年龄，按文化编班。教师、校长与学生家长密切联系，从各方面照顾学生，帮助家长解决困难。如路远的学生，老师就经常送她们回家。学生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可以写简单的信，记简单的账，个别的还可以给人读报。

邵清华作为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位女县长，她爱民为民的事迹很快传开了。延安《解放日报》在专门报道中写道：“该县政府在她的主持下，一切均井井有条，成绩斐然，深受该县民众之欢迎。”《新华日报》也称赞她到任不久就“威声大振，在老百姓心目中成了真正的民之父母官了”。

1943年，邵清华调离安塞，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之后，在河北、天津的妇联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1993年退休，2013年2月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95岁。

红装白马驰骋哈东攻城略地……

——赵一曼烈士纪念塑像碑文敬读

□ 刘淑滨 曲晓溪

赵一曼烈士纪念塑像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一曼街西段的街心公园中。为纪念赵一曼烈士英勇就义50周年，1986年8月2日建此塑像。塑像由花岗岩基座、纪念碑和铜像三部分组成。走进公园，迎面是英姿飒爽的赵一曼烈士塑像，塑像基座的背面刻有碑文《抗日民族女英雄赵一曼》，全文如下：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别名一超，李淑宁，汉族，一九〇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县。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六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七年一月，党派她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同年秋，转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一九二八年冬回国，先后在宜昌、南昌、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奉命来东北，任满洲总工会组织部长、哈尔滨市总工会代理书记。一九三三年四月，参与领导了著名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一九三四年夏，赴珠河抗日游击区，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后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治委员。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同日伪军激战身负重伤被俘。她利用监押就医之机，向身边的看守和护士晓以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使他们转变立场，一同潜往游击区。途中，不幸被敌追及，重陷图圈。赵一曼面对种种酷刑，坚贞不渝，宁死不屈，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于珠河县（今尚志县）小北门外英勇就义，时年三十一岁。

时值烈士就义五十周年，哈尔滨市人民敬铸铜像，以志千古。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日

碑文简要记载了赵一曼矢志报国、英勇杀敌、威武不屈的英雄壮举，字里行间表达了对女英雄崇高的敬意和无限的缅怀，读后震撼人心、令人肃然起敬。

冲破礼教女党员

出生于四川南部山区的赵一曼，从小就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思想，曾经

以绝食来抗争反对缠足。少年时期她开始接受进步刊物，更加坚定了反对封建制度、进行社会革命的理想。1923年，赵一曼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争取外出求学的权利，赵一曼多次同以家长哥哥为代表的封建势力据理力争。她以犀利的笔触一气呵成，写就了数千言的反封建檄文《被兄嫂剥夺求学权利的我》，表明自己“极想挺身起来，实行解放”的态度。赵一曼还在家乡成立了妇女解放同盟组织，积极帮助妇女同胞摆脱包办婚姻、受男性虐待等封建束缚。她还办起了女校，使贫苦农民的女孩子和成年妇女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

1926年赵一曼走出巴山，奔向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考入宜宾女中。她在题为《“不如归去”与“炒米糖开水”》的呼叫声谁更凄惨》的习作写道：贫苦的人民，为了求生存，被迫做小贩沿街叫卖“炒米糖开水”！这种叫卖声，深夜传来，扣人心弦，每每听之而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这种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必须加以改造！赵一曼深刻的思想、改造社会的大胆主张，受到老师的好评和同学们的敬佩。同年春中共宜宾特支成立，赵一曼转为中共党员。

红装白马女政委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赵一曼被党派到东北地区组织开展抗日斗争。从此，她由一个气质高雅、嗜书如命的大家闺秀成长为英勇杀敌、身先士卒的战士。她曾以诗言志，在《滨江述怀》中抒发了坚定的抗日意志：“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

1934年，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经组织研究决定，派赵一曼到满洲珠河（今黑龙江省尚志市）开展工作。长得瘦小、白皙，有点儿“洁癖”，操南方口音的赵一曼，要把自己融入贫穷落后纯朴的东北山区农村群众之中，要克服许多困难，但她很快就在大猪圈、小猪圈（今尚志市亮珠乡）建立了反日农民会、妇女会、儿童团。她领导妇女会组织妇女们为部队做军鞋、军衣，送军粮支持前线，安排儿童团为部队放哨，传递情报，还从农民会中选出30名青年，组织农民自卫队。

在哈东地区，赵一曼充分发挥黄



埔军校科班出身的优势，指挥部队屡挫日伪军，逐渐打出了威名。有一回，第三军一师二团在铁道北的侯林乡山里活动，突然被五六百日伪军包围，全力反击仍无法突围，情况万分紧急。这时突然从敌人背后传来枪声。只见赵一曼骑着一匹白马，带领游击连及时赶到，从敌人背后发起猛攻。敌人见被抄了后路，顿时大乱，二团立即组织反击，里外夹攻，使我军转败为胜。这次战斗后，敌人在报纸上称“女共党赵一曼红装白马驰骋哈东攻城略地……”从此，骑着白马、手使双枪、英勇杀敌的“赵尚志妹子”在珠河抗日游击区广为流传。

万民永忆女先锋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陈列着一张母子合影的照片，一位年轻而漂亮的母亲，怀抱着自己刚刚两周岁的儿子。母亲那坚毅的神情中透出无限的温柔和慈爱，怀中的孩子依偎在母亲胸前，安详和宁静中充满着好奇。

这是赵一曼即将奔赴遥远的东北抗日战场时与年幼的儿子宁儿离别前留下的唯一纪念，而这分别竟成为他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杨云成

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严明党的各项纪律和规矩。在国民党封锁围堵、日伪军“扫荡”进攻的双重压力下，迫切需要党内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总结张国焘、王明的路线错误，党中央认识到“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首次对“四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进行概括，将其定位为“四项最重要的纪律”。随后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相继出台，党的各级机关的职责任定、工作规则以及党员干部的行为规范更加清晰明确。强调纪律面前一律平等，无论是中央委员，还是一名党员，无论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无论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支部委员会，都要遵守纪律，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此外，这一时期还将严守党的纪律上升到关乎党的性质的高度。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因素之一就是“党的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这些纪律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不得逾越。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首先是完善党内监督。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由各中央局决定，在区党委之下，设置监察委员会，主要负责监

察党的机关、党的干部和党员对党章决议的执行情况，党的各种机关的账目情况以及对党员处分等。为适应革命形势任务发展变化，1945年党的七大提出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成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其次是健全人民监督。为扩大人民监督，规定广大群众“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还要求各下级政府或公务人员，如接到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需随时负责转呈上级政府。1942年颁布的关于派公正干部切实调查群众控告案件的命令以及1945年颁布的各县政府对人民控告干部的案件应及时认真负责处理的命令等，都为人民监督政府提供了制度化保障。

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党明确提出要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提高认识，改进工作。积极参加组织生活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主要平台。1941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规定，要求“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充分利用媒体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补充。《解放日报》从1941年5月16日创刊到1947年3月27日停刊，常态化刊登批评性报道，成为党改正错误、联系群众的有效方式。仅在整风运动期间，《解放日报》就刊登各类批评性报道78篇，涉及思想认识、工作作风、工作意见和

们母子的永诀。

1935年，在一次反“讨伐”战斗中，赵一曼因受伤流血过多昏迷被捕。她被施以各种残酷酷刑，身体受到极大摧残。然而，敌人可以摧毁她的身体，却无法摧毁她的信念。

1936年8月2日，无计可施的敌人把赵一曼送到她长期战斗过的珠河县行刑示众。在押往珠河的火车上，赵一曼静静地望着窗外美丽的山河、肥沃的黑土地和被烧毁的村庄。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为了深爱的祖国而牺牲，她慨然无悔。但作为一个母亲，却怀着无限的牵挂和深深的遗憾。

赵一曼向看守要来纸和笔，写下给宁儿最后的遗书：“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这封遗书全篇只有150多字，寥寥绝笔，殷殷叮嘱，充满着感动地的浩然正气和始终不忘的家国情怀。赵一曼怀着对祖国无比的热爱、对儿子的深情眷恋、对法西斯侵略者的刻骨仇恨，英勇就义。敌人用罪恶的子弹夺去了赵一曼的生命，但她的英名永远留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建议等。党员干部站在党的立场上，从帮助提高认识、纠正错误、推进工作的角度出发，抓住主要问题，不拘泥于“细枝末节”，逐步形成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原则。

开展理论大学习。为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提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在大规模发展党员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趁机渗入党内，而战争环境下老党员的教育又存在短板。针对这些问题，党中央提出“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其在在中国的具体运用”。1939年2月，中央成立干部教育部，统筹负责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并制定《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延安4000多名在职干部编班编组，实行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度。1940年中央又连续作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等，各地党的领导机关依托党校开展了大规模干部教育。据初步统计，延安时期先后有30多个规范干部教育的文件出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毛泽东立足中国革命实践创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是党内学习的主要资料，同时党史和国情的教育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延安时期的干部大学习，特别是整风运动，极大提高了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